

# 在二轨外交中感受国际秩序“破”“立”之争

赵隆

对于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观察者而言，2025年以来的这一年多时间注定将被频繁回望与反思。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动荡变革特征愈发鲜明。过去一年多来笔者出访十余次，前往美国、欧洲、俄罗斯、巴西、越南以及中亚、高加索等国家和地区参加多场二轨对话与国际论坛。一个愈发清晰的感受是：国际战略界的讨论重心，正从具体冲突、区域架构或双边博弈，转向对国际秩序“新”“旧”转换及其“破”“立”逻辑的整体性反思。

总体来看，当今世界变乱交织，挑战与机遇并存。一方面，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强权霸凌行径不断撕裂秩序共识；另一方面，多极化趋势与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为秩序的演进和变革提供现实基础。在此背景下，世界对中国角色的关注，已不再停留于抽象评判，而是转化为对稳定性、确定性与制度供给能力的现实期待。

## 难以掩饰的“失序焦虑”

与2024年相比，这一年多来国际智库交流的一个显著变化，在于讨论议题明显“上移”。人们不再满足于围绕某一地区冲突或某组双边关系展开技术性讨论，而是直指全球秩序、国际体系与世界格局的结构性问题。去年年初，笔者在华盛顿参加美国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的中美关系二轨对话。彼时，美国现任政府刚刚上台不久，与会专家不但关注美国新政府如何评估盟友与伙伴的价值，第三方国家能否平衡中美关系，全球治理将走向何方等议题，还专题探讨了全球和多边框架下的中美关系。随着美国政府关于控制巴拿马运河、购买格陵兰岛、“吞并”加拿大等的言论和实践持续发酵，国际战略界进一步陷入缺乏体系与秩序共识的“分裂”状态。

美国去年年底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今年年初的国防战略报告，展现出局部有限收缩、定向激进扩张的战略导向，围绕“半球霸权”巩固势力范围和战略纵深，引发有关世界进入利益替代原则、实力替代规范、单边替代多边的忧虑。不久前，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达沃斯论坛上提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已实质性终结。《2026年慕尼黑安全报告》提出，“战后国际秩序正进入

被持续削弱甚至主动拆解的阶段，世界面临更大不确定性与风险”。在不少西方人士（尤其是欧洲战略界人士）看来，冷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制度框架正在松动，一种难以掩饰的“失序焦虑”贯穿于柏林、布鲁塞尔、斯德哥尔摩等地的讨论之中。

## 日益增长的“南方强音”

如果说西方世界在秩序动荡中弥漫着焦虑，那么全球南方国家则展现出更为鲜明的主动性与自信心。2025年7月，笔者赴巴西里约热内卢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前夕举行的“里约—北京对话会”。会议围绕国际经济秩序改革、人工智能治理以及绿色转型等议题展开。其间明眼可见的一个普遍共识是：在单边主义抬头、全球治理碎片化加剧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加强协调合作，不仅是维护发展权益的现实需要，更是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平、更加尊重主权方向演进的重要力量。在随后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及新开发银行年会上，与会代表呼吁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国际金融架构改革，通过扩大本币结算比例、强化跨境金融合作、创新绿色融资工具等方式，增强新兴经济体的金融韧性。不少与会者直言，当前全球金融体系在储备货币结构、信贷分配机制与风险评估标准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失衡，新兴市场国家必须通过推动制度创新来提升话语权。

另外，在越南外交学院与美国史汀生中心联合主办的中美俄“三方对话”上，越南学者明确表示，“中等国家”不愿也不会陷入大国竞争的选边站队逻辑，更不希望发展议程遭受安全议题严重挤压。各国的战略自主与多元平衡并非摇摆不定，而是要在大国之间保持合作空间、避免过度依附，进而能够在秩序变革中发挥“桥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南方国家不仅强调集体发声，也更加重视自身特色的合作经验与制度创新路径。在阿塞拜疆召开的第十三届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智库论坛上，来自16个亚欧国家的学者强调亚洲作为全球最具经济活力地区的独特价值，探讨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

观，应对数字时代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倡导具有亚洲特色的安全治理路径。如何在全球化重构下提升供应链韧性、利用数字技术推动发展转型、深化亚欧互联互通合作等成为共同关切。日益增长的“南方强音”，正在从理念倡议转化为制度设计与政策行动，成为国际秩序“立”的重要推动力量。

## 无处不在的“中国期待”

在秩序动荡与制度赤字并存的背景下，世界对中国的关注明显升温。今年以来，美国先后对委内瑞拉、伊朗采取单边军事行动，不仅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形成破坏性冲击，导致“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话语破产，更引发有关世界进入“新”“旧”秩序转换期的大讨论，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于“非西方式”秩序变革的期待。面对国际秩序“激进重构”和“渐进改良”的路线之争，中国的秩序改革愿景、方案倡议和推进路径深受各方期待。

具体来看，美国政府频繁“毁约退群”“撤资断供”削弱国际多边合作机制，全球治理的“失败主义”情绪持续蔓延，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面临结构性

缺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在国际上引发强烈反响。在多个国际论坛与二轨对话中，有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和注重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的政策落脚点与推进路径，成为各方关注和追问的重点。围绕“大金砖合作”、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以及中国—中亚合作的制度创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进展，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更广泛层面的成功实践，被不少国家视为探索“非西方式”秩序变革路径的重要范本。

与欧洲学界的交流也呈现出一些微妙变化，其对中国的关注不再局限于竞争与防范，而是开始更多聚焦“如何共处”。去年12月，笔者受邀参加欧盟委员会和欧盟轮值主席国丹麦主办的“第二届欧洲科学外交大会”。该会议是欧盟“欧洲科学外交框架”下的重要活动，会议原本旨在强化欧洲的科技主导地位，但在讨论中，中国的科技进步和创新潜力、如何推动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制定以

及新兴领域标准对接等成为无法回避的话题。不少欧洲学者都坦言，若仅以安全逻辑界定对华科技关系，就难以回应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全球性挑战，在理念互鉴与规则协商层面保持沟通依然不可或缺。

## “先立后破”方为解局之道

回顾一年多来的国际交流，可以清晰看到三条相互交织的主线：一是个别国家奉行唯我独尊、强权至上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不断冲击国际社会既有共识和制度框架，侵蚀多边合作根基，构成国际秩序“破”的现实背景；二是多极化趋势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为国际秩序的“立”提供结构性支撑；三是中国不仅是战后国际秩序总体框架的重要维护者，也是未来秩序变革演进的建设性塑造者。

同时，也须看到，国际战略学术界距离完整、准确理解中国的秩序愿景、改良路径与优先方向仍然存在一定的认知差距，对于中国角色与意图的误解、误判乃至刻意曲解依旧存在。这对我们各层面的国际交流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需要聚焦自身政策和立场的正确清晰解读，也要倾听各方关切担忧，通过坦诚持续的沟通积累信任。

总体而言，国际秩序演进从来不是线性替代或简单的此消彼长，而是力量结构重组、价值理念碰撞与制度安排调适等长期交织的结果。“破”不应被简单等同于全面坍塌和推倒重来，它更多体现为既有机制在功能失灵、权威削弱背景下的结构性松动；“立”也绝非另起炉灶、凭空建构，而是在既有框架基础上的渐进修正、规则优化与制度再平衡。在这一历史关口，坚持“先立后破”尤显关键。所谓“先立”，就是优先巩固多边合作的制度基础，完善全球治理的公共产品供给，增强规则体系的包容性与代表性；所谓“后破”，则是在新共识、新机制逐步成形之后，对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部分作出必要调整，而非简单否定、仓促替代。通过保持政策的延续性、方案的包容性、合作的普惠性和发展的可预期性，中国将为国际秩序的变革演进注入更多确定性与建设性。▲（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大家论道

# “未雨绸缪”锻造中国能源韧性

丁隆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超过两周时间，作为世界“能源库”的中东地区陷入剧烈地缘政治冲突，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导致国际油价出现近些年来罕见的飙升势头。在国际能源供应短缺短期难以缓解、油价剧烈波动带来严重经济冲击的现实背景下，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准备或已经采取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等紧急措施应对棘手的“石油危机”。这时，包括美国主流媒体在内的一些国际舆论注意到中国在当前“全球能源恐慌”形势下的“相对从容”，并开始探究这种韧性背后原因何在。

诚如一些分析所言，中国在能源安全问题上早就开始“未雨绸缪”，这奠定了当下面对全球能源市场动荡时的底气。1993年开始，中国从过去的石油出口国转变为石油净进口国，之后石油进口规模呈现逐年增长态势。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至少三次石油危机表明，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甚至爆发冲突时，国际能源市场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链往往首当其冲，很多时候能源问题还会被政治化和武器化。面对这种现实，加之“富煤、贫油、少气”的一次能源禀赋特

征，我国在战略规划和具体实践层面都对能源发展与能源安全给予高度重视。

近些年来，我国努力稳定国内原油产量、充实战略石油储备，实现能源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能源自给率已经达到80%以上。其中，原油产量稳定在2亿吨水平，天然气产量连续8年增产超百亿立方米，煤炭产能合理充裕，电力装机容量超过37亿千瓦。有媒体预估，即便从中东地区进口的原油中断，中国的石油储备规模也能弥补长达数月的供应缺口。

况且，在加速拓展能源国际合作过程中，我国能源进口多元化、平衡化不断推进。目前，西北、东北、西南、海上四大油气进口战略通道，中亚—俄罗斯、中东、非洲、美洲、亚太五大油气合作区，已经建成并进一步巩固完善。2025年，中国企业海外油气权益产量当量高达1.96亿吨，在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运营200多个油气投资合作项目，

海外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持续增强。

另外，绿色低碳转型对于我国能源安全的重大意义正在进一步显现。我国已经建成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10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22.2亿千瓦，占全国电力总装机的59.2%，其中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均稳居世界第一。核电在运在建规模跃升至世界第一。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迅猛增长，对于增强中国能源供应体系的自主可控具有显而易见的积极正向作用，使中国在国际油气资源供应紧张和价格波动的情况下抗冲击能力更强。

能源是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动力，能源安全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事”。正是得益于在战略规划以及具体实践层面的一系列长期努力，我国现已基本形成煤、油、气、核及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

应保障体系。

在当前全球能源市场剧烈动荡的背景下，国际舆论关注和探究中国如何在能源安全问题上“未雨绸缪”，同时也应认识到这种努力以及由此形成的韧性，对于国际社会应对油价上涨影响、维持世界经济复苏势头本身就是一种贡献。

一方面，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的新能源大国和强国，为全球贡献80%的光伏组件和70%的风电关键零部件，“新三样”等产品出口客观上促进了世界范围内新能源技术发展与应用国家的“平权”，尤其是使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低碳跨越式发展获得充沛赋能。另一方面，按照通常的供需传导机制，国际油价飙升往往导致世界经济通胀压力普遍上涨、增长势头放缓、主要货币陷入政策两难等。作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和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中国强化本国能源安全，不仅有助于自身抵御潜在的输入性通胀，还能借助全球供应链枢纽的优势地位帮助稳定国际消费品市场，客观上带来平抑全球通胀和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的积极效应。▲（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